清史纂修（本栏目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支持）

醇亲王奕譞与清廷的东北练兵

张易和

［摘要］ 中法战争后，醇亲王奕譞主持展开大规模东北练兵。不满于光绪初奉天、吉林打破旗民畛域的地方改制与边疆经略，醇王有意通过练兵“培植故土”，加强八旗在东北的军政优势。因户部及李鸿章的制约，醇王原定练兵饷额被迫大幅削减，新练军扩充计划无法实现；醇王拒绝改革已被证明失败的换练制，且坚持专用旗人，以神机营垄断训练，造成新练军弊端丛生。1890年，在国际关系变动的背景下，醇王全力支持组建黑龙江镇边军，令新练军缩编节饷，转而造就了另一支较具战斗力的防军。以醇王为中心，分析东北练兵的曲折进程，或可从政治局势与满汉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检讨甲午战前边防建设的得失。

[关键词] 奕譞 海军衙门 满汉关系 东北练兵 镇边军

[中图分类号] K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2–0165–013

光绪十年（1884）甲申易枢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奉慈禧太后懿旨，会商军国要务。次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成立海军衙门，由奕譞亲自主持。清末以来，世人多批判醇王与清廷新中枢将海军衙门变为“慈禧的私人内务府”，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逐步对醇王之功过进行更立体的考察，醇王“整军经武”的抱负与实践，及其对北洋海军、铁路等近代化事业的支持和推进作用，既往研究已有较充分的揭示。[①]

海军衙门的职权远不限于海军事务，而是广泛涵盖各项自强新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光绪十一年开始的东北练兵，规模一度接近3万人，年饷100万两，乃同时期全国最大规模的练兵活动。其饷项、训练、人事完全由海军衙门以及醇王统领的神机营负责，醇王为此付出大量心血。有学者指出，在醇王的规划中，东北练兵与北洋海军的重要性持平相当；更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清廷将过多资源投入东北练兵，才导致北洋海军发展受阻。[②] 然而，东北新练军在甲午

［收稿日期］ 2025-02-13
［作者简介］ 张易和（1999— ），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zhangyihe99@pku.edu.cn

① 杨益茂：《奕譞与洋务》，《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王明灿：《奕譞研究》，台湾中正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潘向明：《论醇亲王奕譞》，《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徐笑运：《醇王当国与晚清政局——以甲申易枢后主政经历为中心（1884—1890）》，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65-149页。

② 徐笑运：《醇王当国与晚清政局——以甲申易枢后主政经历为中心（1884—1890）》，第116页；潘向明：《论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清朝的国防战略失误——兼论北洋海军停止发展的原因》，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98-133页。

战争中表现恶劣，于光绪二十一年裁撤，可谓糜饷无功。[①] 这项影响到甲午战争结局的重要举措及其成败得失，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学界对此次东北练兵章程、营制、武器装备等基础史实已有研究，[②] 但大多将其置于晚清军事史的框架下，视为全国各地组建“练军”的一环；就其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与其他省份练军大同小异。实际上，这次练兵拥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它不仅希望对抗外敌，巩固国防，而且意在恢复旧制，巩固“国本”，因而凸显了满汉关系等清朝的基本问题。新练军的筹议、组建与规模变动，皆与光绪初年以来清廷高层和东北的政治局势变化紧密相关。另外，醇王在新练军之外，还大力支持黑龙江镇边军的创建，该军对东三省练兵进程亦有重大影响，既往研究基本未能涉及。本文将通过考察近年公开的醇亲王府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以及此前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各类档案、函牍、日记史料，紧密结合甲申易枢前后的政局，从醇王的筹划以及清朝内部各方互动的角度，考察练兵计划制定、执行与变动过程，重点探讨醇王的隐秘意图对练兵实效的影响，进而希望对甲午战前东北军备的成败得失形成更深入的认识。

一、醇王的练兵意图与规划

道光以降，尤其是咸同战乱时期，清朝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和控制力下降，对外对内都压力陡增。同光之际，清廷着手编练了较大规模的东北练军，光绪六年起，更拨出每年 200 万两巨款作为东北边防经费。中法战争结束后，醇王力主推进新一轮练兵，就其动因，既往研究多从边防压力，以及醇王的“固本”思想等角度笼统叙论，未能与甲申易枢前后的政局变动紧密结合。通过分析新见史料，可以更大程度上厘清醇王的决策内幕与深层考量。从醇王的练兵动因和构想中，新练军某些根本性局限已可见端倪。

此次练兵的直接起因，可能与光绪十一年四五月间“朝俄密约”传闻有关。[③] 六月，清廷谕令军机处、总署会同神机营王大臣筹议东北边防，随后命前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钦差大臣督办东三省练兵。海军衙门日后对于练兵之发端，则作如下追述：“简派大臣办理练兵事宜，原因东三省外邻强国，内多伏莽，驻扎客军既非常法，现练旗兵复分畛域。”[④] 不过，此时东三省新旧兵力已达到 9 万人，岁饷 373 万两，[⑤] 清廷高层不乏反对大规模扩建新军的声音（后文详述），军备层面的必要性似并不充分。练兵筹议背后，实有醇王更深层的政治考量。

醇王自同治四年（1865）起主掌神机营，兼任都统多年，长期主持京城旗务与军务，力图重振八旗军事实力。其对东三省“根本重地”也高度关注，同治年间即数次上奏，表达对军兴以来旗兵积弱、移民涌入局面的担忧，要求恢复行围旧制、增加旗兵俸饷、严禁流民。[⑥] 而光绪初年至甲申易枢前，奉天、吉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地方与军备改制，正与醇王的主张背道而驰：光绪元年，盛京将军崇实奏准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仿照总督、巡抚体制，地方州县官满汉兼用，

---

① 东三省在同治、光绪初年，已分别编练各省练军；本次醇王主持的练兵，新组建“盛字营”“吉字营”“齐字营”练军。为避免混淆，本文将前者统称为“旧练军”，后者统称为“新练军”。

② 陆方：《清末东三省兵制变迁》，《军事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李英全：《更新而不去旧——晚清旧式军队的整顿和改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1–66 页；方玉权：《改造八旗与强边未竟：晚清东三省练兵（1885–1895）》，《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③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582 页。关于“朝俄密约”事件经过，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1 卷，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305–314 页。

④ 穆图善等：《东三省边防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 17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021 页。

⑤ 《奕譞等奏》，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第 536–539 页。

⑥ 徐笑运：《醇王当国与晚清政局——以甲申易枢后主政经历为中心（1884—1890）》，第 110–111、115–116 页。

削弱八旗官员的权力，“迈出了由军府制度向行省制度转变的第一步”；[①] 光绪三年铭安署任吉林将军后，效仿奉天增设民官、移民实边，主张边防各营“多招民勇，抽换兵丹”。[②] 光绪六年，由于中俄“伊犁交涉”时期东北军事压力增加，清廷更派遣吴大澂帮办吉林边防，仿照淮军营制组建靖边军，选用汉人将领，将民勇与旗丁混合编练。[③] 与之相对，醇王于光绪二年上奏，强调国家之根本以关东为重、以旗仆为先，明显不满于上述改制。[④]

甲申易枢前后，随着醇王在清廷高层话语权上升，不少东北旗人官员与醇王密切联络，抨击改制，呼吁维护八旗地位。光绪九年就任的盛京将军庆裕致函醇王表示：“从前归并事权，专重地方，抑置旗员似觉太过……与其频年竭若干之饷，招募绿营，曷若训练旗兵，上备国家干城之选，下裕旗丁生计之谋。”[⑤] 同年就任的吉林将军希元亦指责新设民官、委员损害旗人生计，“视旗营官兵则几同赘瘤”。[⑥] 次年六月到任的吉林副都统恩泽在上醇王禀函中建议将东三省流民悉数招为官庄、台站屯丁，使“旗兵日见其多”，更严厉抨击此前主政者“偏持私意，添设民官多处，教其分类作敌，甚至压胜，刻间遇事抵牾，竟成水火”。[⑦] 黑龙江将军恭镗的幕僚徐宗亮亦记述，黑龙江籍官员“出入内廷，声气联络”，顽固阻挠开垦实边。[⑧]

新设东北地方官员选任过程中，张佩纶等“清流”派凭借与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切关系，发挥了很强影响力。张佩纶记述，其与张之洞合谋促成吴大澂获任吉林边防帮办，又通过李鸿章推荐顾肇熙前赴吉林。[⑨] 顾肇熙不久后出任吉林分巡道。张佩纶与吴大澂、顾肇熙保持通信，建言增设民官、重用汉员，甚至希望将顾肇熙“假以监司”。[⑩] 甲申易枢后，“清流”派政坛失势，醇王亦对张佩纶积憾甚深。旋即，清廷密谕吉林将军希元查核顾肇熙居官才具，希元复奏同时致函醇王，指责顾肇熙心存成见，轻视旗人，请求选择旗员取而代之，并再次批评吉林地方改制。[⑪] 很快顾肇熙即被开缺。可见，在东三省旗人高官的刻意迎合或推波助澜，以及高层政局变动背景下，慈禧与醇王已着手对东北政策加以调整。

数年后，醇王在主持海军衙门议复黑龙江边防措施时，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东北边防建设与旗民关系的深层考虑：

> 盛京变更制度，自崇实始，虽为因时起见，仰溯先朝深意，多不符合。铭安复继武于吉林，识者亦颇不韪。奉天、吉林两省客民日多，旗丁几成寄旅，尚赖黑龙江地处极边，古风犹存……臣等公同商酌，开荒不过一隅，固无所谓富强；招民不过耕耨，更无所谓御侮。应请饬下该将军再行悉心筹度，详审损益，断不可轻招流民，为因民设官地步，效盛京、吉林新章，旗民分治，主客相形，为舍本逐末之谋也。至于禀赋习尚，限于风土，本难强使一致。东三省之兵甲于内地者，惟恃田猎操练。近年行围屡停，文墨是尚，卒之用违所长，两无成就。高宗纯皇帝尝有文既不文、武亦不武之谕，实切中东三省近年颓风陋俗。今欲议强兵，似须自将军

---

①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86–689 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 51，光绪三年五月辛酉；吴大澂：《致喜桂亭参赞书》，陆德富、张晓川整理：《吴大澂书信四种》，凤凰出版社，2016 年，第 182 页。“兵丹”即八旗制兵和西丹。西丹指尚未成丁的男性旗人，是八旗正规兵丁的后备力量。

③ 陈可畏：《吴大澂与晚清东北边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醇亲王奕譞，光绪二年四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03–7423–037。

⑤ 《醇亲王府档案》，盛京将军庆裕等，档案号：38–00–000–000004–0051。

⑥ 《醇亲王府档案》，吉林将军希元等，档案号：38–00–000–000003–0034。

⑦ 《奕譞档存章京恩泽为行抵吉林任事日期并查看沿途情形事禀文》，光绪十年七月初一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82 册，大象出版社，2011 年，第 293–294 页。

⑧ 徐宗亮著，李兴盛、张杰点校：《黑龙江述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8 页。

⑨ 《张佩纶日记》，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谢海林整理，凤凰出版社，2015 年，第 316–317 页。

⑩ 张佩纶：《复顾皞民观察》《致吴清卿太仆》，石向骞等点校：《涧于集》，燕山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761、775 页。

⑪ 《吉林将军希元为感谢拨银添练防军并奉谕查明顾肇熙才具事禀爷（奕譞）文》《奕譞档存吉林将军希元奏遵旨查明吉林分巡道顾肇熙才具折》，《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82 册，第 247–257 页。

以次不惮勤劳，整顿围操各事，各城副都统均请简放曾经战阵、立功最著之京旗、东三省之员，以为提倡，自必渐复旧规。所谓本立道生，正不在另筹新策也。[①]

此折由庆亲王奕劻领衔具奏，其实完全是醇王亲自起草，醇王专门向慈禧太后上有奏片说明。[②]从中可见，醇王极力维持东三省旧制、“古风”的话语背后，更隐含对八旗政治地位的现实担忧。按照光绪初地方改制的规定，东北民人由新设民官管辖，旗署不得干涉。随着内地移民迁入，“因民设官”不断增加，旗衙的政治地位势必边缘化。正因如此，东北边防筹议之初，醇王曾致函庆王表示：“顷奉懿旨会议东省防务，因思客军取效一时，土著可期久远。诚能借此培植故土，用复旧风，再笼络流氓俾为我用，洵千载一时之善策。”[③]通过精练旗人“土著”，不仅可重建八旗军事骨干力量，未来还可将“流民”编伍并纳入八旗精兵的控制之下，亦即将地方民人更大程度上整合入八旗系统，从而强化八旗在东北的军政优势地位。这恐怕才是醇王力主大规模练兵的深层考量。

在这种隐秘意图之下，醇王一手主导制定练兵规模、饷数、装备、训练、选将用人计划，难免偏狭。李鸿章称：“邸（醇王）意专注旗兵，盛推春岩（穆图善），全是隔靴搔痒。枢臣梦梦，即鄙人少知兵事，亦不能赞一辞。”[④]王大臣会议之前，醇王已授意神机营先行拟定了练兵计划草案，与既往研究引用的正式版本有显著差异。其中涉及练兵规模、饷数的条目如下：

一、请饬部筹拨专款，每省每年五十万两（新加洋药税一款似可拨用）。

一、每省练兵五千,一年后撤一半归伍，续练二千五百名，次年再将陈练一半撤回，又续练二千五百名，以三年计之，可得练军一万名。

…………

一、现值军务甫竣，筹饷购械均非易易，故以每省练五千人为率，将来帑项充裕，仍拟每省万人，作为常川防军，俾资捍卫。[⑤]

此计划存在两项重要问题：其一，规模过于膨胀，初期年饷即高达 150 万两，规模 3 万人。尤需注意的是，全部兵员皆须新练，并非由旧军改编，醇王日后还着重强调了这一点：“神机营原议每省拨专款五十万两，各练兵五千名……曰饷曰兵，皆指现放之饷、现练之兵以外而言。”[⑥]同时规定，未来该军将由换练制过渡为常备军，规模与饷需还将倍增。相比之下，李鸿章预估次年北洋海防经费时，即使将修建旅顺船坞的新增用款计入，向海军衙门请领数额亦仅 120 万—130 万两。[⑦]巨额练兵经费势必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甚至挤压北洋海军的发展，这也导致练兵计划在清廷高层遭到多重反对（下节详述）。

练兵计划的另一重要缺陷是其分年“撤半补半”的换练制。尽管主事者自诩此为效仿德国预备役制度的先进兵制，当代也有学者认为此举改进了以往练兵的弊端，[⑧]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其实早在光绪初年，黑龙江“精锐营”练军就实行过换练制，将九千名步兵分为两班，每两个月轮流操练，但很快发现效果不佳，“两月之间，口号、步伐万难熟习，则又换班归农散置。迨到接班，原学既不甚熟，废弃似必茫然，上须从头教起，心既不专，艺何能精”，不得不缩减规

---

① 《奕劻等奏为遵旨议复事》，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54 辑，第 387–388 页。

② 《宫中档朱批奏折》，王大臣奕譞，光绪十五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3–0364–037。

③ 叶渡：《清醇亲王奕譞书札册》，附录第十八函，《首都博物馆丛刊》第 14 期，2000 年。

④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第 582 页。

⑤ 《醇亲王府档案》，神机营，档案号：38–00–000–000005–0018。

⑥ 穆图善等：《东三省边防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 17 册，第 1021–1022 页。

⑦ 李鸿章：《致醇邸 筹议海军经费》，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第 605 页。

⑧ 方玉权：《改造八旗与强边未竟：晚清东三省练兵（1885—1895）》，《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模，改为常川训练。[①] 而且，吉林、黑龙江旗丁户籍分散，“西丹住址有距省一千二百多里者，吉省尚有乌拉总管所属打牲西丹，调换至外城，传调极为不易；江省之呼伦贝尔距省亦有一千多里，本系游牧，尚有西丹距该总管衙门较远者”，[②] 往返调集大费周章，战时更不可能召之即来。可以说，换练制对当时的东北练兵而言，明显是徒务兵多的脱离实际之举，而且是重蹈旧练军覆辙。

选将用人层面，醇王更力图以旗人垄断，十分排斥李鸿章在内的汉员。醇王曾在条陈内提出：“东省统练大臣宜专司训练……外间不得掣肘。三年后尽撤客军，凡调遣、防剿，皆责成该大臣与本省将军会办。”[③] 该军作为醇王构想中取代“客军”的骨干力量，由朝廷钦派的练兵大臣统辖，钦差大臣之下总统、帮统等高级军官皆奏派侍卫大臣充任，兵员则全部选用八旗制兵、西丹。[④] 练兵大臣穆图善原计划由神机营与北洋共同派遣教习，而海署要求改由神机营单独负责训练事务：“神机营洋枪队皆用清语口号，外省皆用洋语口号……且东省以清语为本，拟即由神机营选择官弁前往教习。”[⑤] 由是，新练军不仅兵源深受局限，更将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北洋集团军事人才排斥在外，还形成了基本独立于三省地方、仅向清廷负责的封闭体制。后文将看到，这也对新练军的指挥训练造成了严重损害。

二、练兵规模受限与弊端丛生

醇王“隐执朝政”实有一定限度，政治威望亦属有限，对朝臣不具备足够的强制力。[⑥] 这对东北练兵进程深有影响。从神机营拟定草案到新练军正式成军，练兵计划一改再改，其核心问题即压缩练饷、节省经费，醇王不得不向户部和李鸿章有所让步，以照顾财政紧张的现实以及北洋海军建设的需求。在练兵规模受限的背景下，醇王仍坚持培植旗人的初衷，拒绝改革换练制，专用旗人兵将，最终导致新练军弊端丛生、难期实效。

醇王的练兵计划在朝中筹议阶段，即面临被消解的风险。总理衙门章京袁昶奉命起草的王大臣会议东北边防奏折底稿，虽然写入了“每省练精兵五千”的计划，但并不提及新拨饷数，亦无未来倍增兵额之语，反而以相当篇幅强调东三省“兵力不可谓尚单”，“饷力不可谓不厚”，不主张一味扩军。[⑦] 正式奏上的议复折更规定，新军由三省已有之练军“重加挑练”，饷项也应“就各该省旧有之饷从实核计”，仅筹补新旧相抵仍不足的部分。[⑧] 清廷就此向练兵大臣穆图善下达谕旨，令其“即就该三省已练之军，详加挑选”。[⑨] 练兵的主要任务变成了选练旧军，显非醇王本意。提出反对意见的，最有可能是参与筹议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阎敬铭。其曾向袁昶痛论财政匮乏，指责当国者强行铺张，“练兵而兵愈弱”。[⑩] 继阎敬铭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亦抱怨：

---

① 《署黑龙江将军文绪等为精简练兵数目事奏折》，光绪八年六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等编：《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37 页。

②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所拟新练兵之法务臻妥善即遵照办理及所拨饷银一俟咨覆到日以便遣员祗领事咨钦差大臣定安》，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08509-0001。

③ 彭长卿：《醇亲王奕譞亲书信札及条陈》，《紫禁城》1987 年第 4 期。

④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 78 页。醇王所拟练兵计划亦有将流民单独编伍之条目（参见《醇亲王府档案》，神机营，档案号：38-00-000-000005-0018），但规定“民兵”俟旗兵成军后再议，事实上从未实行；其目的主要是对流民加强统辖，防范其“流而为匪”，并非允许民人加入新练军。

⑤ 穆图善等：《东三省边防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 17 册，第 1034-1035 页。

⑥ 刘文华：《醇亲王奕譞隐执朝政的方式与限度》，《安徽史学》2025 年第 3 期。

⑦ 袁昶：《参军蛮语 · 覆陈东三省边防大略情形折》，朱家英：《袁昶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3 年，第 390-394 页。

⑧ 《奕譞等奏》，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538-539 页。

⑨ 《清德宗实录》卷 218，光绪十一年十月丁亥。

⑩ 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光绪十三年三月，凤凰出版社，2018 年，第 678 页。

“京饷、海军、东边、洋息一时并集，加以瀛台液池之兴作，神皋跸路之修治，其繁费实无纪极。”[①] 户部财政压力沉重，难以完全满足筹饷要求。

醇王对练兵转为整训旧军颇为不满，在主持海军衙门议复练兵详章时明确指出，“如此办理，多划一饷，已练者即少一兵，原非厚集兵力本意”，对挑练旧军的比例提出严格限制，规定客军、绿营均不得抽调，只能从盛京八旗练军四千名、吉林练军与靖边营防军中“抽拨二三成”；对黑龙江更是要求“全行挑练新兵”。[②] 明显可见，醇王意在保证新练军主体仍由新兵构成。

然而，醇王还面临东北练兵与北洋海军的投资平衡问题。东北练兵经费由海军衙门拨发，醇王计划动用海军衙门储备经费、闽粤剩余洋款、各省海防捐输等项供练兵初期之用。[③] 这些经费本可用于海军，更何况当时北洋海军正增购主力舰、新建海军基地，在在需款，李鸿章反复致函醇王争取经费。光绪十一年底，海军衙门试图要求李鸿章酌量裁撤不能海战之船以节约开支，李鸿章对此予以抵制，在致总署函中特别指出：“东省练兵自应由部筹款，似未可再分海军涓滴之余，以致两误。”[④] 很可能正是因兼顾北洋海军需求，次年初醇王主持议复穆图善练兵计划时，虽然坚持大部分兵丁应新练，但也在某些方面削减了规格。例如穆图善拟设立军装、制造局，海署以“用款太巨，此时断难筹拨”为由，不予批准；原议每省各练马队四起，海署则表示“目前经费尚绌，所请四起之处，拟令先练两起，徐议增添”。[⑤] 由此，每省削减了 1000 名马兵，新练军规模由原定 3 万降低至 2.7 万。

此后，李鸿章仍多次游说，促使东北练兵进一步缩减规模。练兵大臣穆图善于光绪十二年五月完成奉天“盛字营”的初轮挑练后，李鸿章致函请求吉林、黑龙江两省练兵从缓：“实虑饷不时至、支放为难”；被拒绝后，又力劝尽可能多挑旧兵。[⑥] 值此之际，慈禧太后突然谕令光绪帝明年亲政，醇王以“海军正在创办，东省甫议练兵”为由奏请暂缓隐退，[⑦] 迫切希望在退出政坛前将北洋海军、东北练兵皆办理就绪，为此更须做好二者的平衡。由此，其主动向来京拜谒的穆图善之子明保表示：“现挑吉、江练兵，或少练若干，以节饷糈。”[⑧] 穆图善随后在吉林挑拨旧有马队两起、步队两营，较奉天多挑旧军五百名，令李鸿章亦感到“殊为过望”。[⑨] 黑龙江方面，虽未挑旧军，但声明考虑到帑项支绌，骑兵所用马匹“在呼伦贝尔产马之区劝捐请奖”，[⑩] 未请单独拨款。

光绪十二年底，东三省新练军首轮挑练各营全部成军，每省马队两起、步队八营，各四千五百人。其中，奉天酌拨旧队兵丹一千名，吉林酌拨旧队一千五百名，黑龙江齐字营全部挑练新兵。在扣抵旧有兵丁随带饷银后，每年饷需确定在 100 万两左右，相较原计划已削减三分之一。[⑪] 随后，盛字营、吉字营经过两次换练，于光绪十四年达到九千人定额；齐字营则奏准

---

① 翁同龢：《复谭钟麟函》，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谢俊美编：《翁同龢集》第 2 册，中华书局，2021 年，第 474 页。

② 穆图善等：《东三省边防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 17 册，第 1022–1024 页。

③ 穆图善等：《东三省边防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 17 册，第 1040–1041 页。

④ 李鸿章：《致醇邸筹议海军经费》，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致总署 请拨海军的饷》，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第 604–606 页。

⑤ 穆图善等：《东三省边防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 17 册，第 1024–1034 页。

⑥ 李鸿章：《复钦差大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福州将军穆》，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 34 卷《信函六》，第 81 页。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醇亲王奕譞，光绪十二年，档案号：03–5688–062。

⑧ 《醇亲王府档案》，钦差大臣穆图善，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档案号：38–00–000–000004–0048。

⑨ 李鸿章：《复钦差大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福州将军穆》，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 34 卷《信函六》，第 81 页。

⑩ 《醇亲王府档案》，钦差大臣穆图善，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档案号：38–00–000–000004–0048。

⑪ 《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穆图善奏》，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洋务运动》第 3 册，第 562 页。

改为三年换练，于次年年底达到定额。[①] 至此，新练军实现 2.7 万人预定规模，但采取换练制，在营数额始终只有半数。在醇王设想中，换练制仅为练兵开端的临时性举措，待筹足饷项后，仍拟扩充为每省一万人的“常川防军”。只是，现有规模尚遭到户部与李鸿章的反对，欲推动将全部兵丁转为常备，即须倍增饷额，显然政治阻力更大，难以实现。光绪十三年以后，虽然“洋药加厘”带来清廷财政收入整体增加，海军衙门陆续奏准户部增拨常年经费,[②] 但从未再提及东北增饷扩军之事。

前文已述，换练制在黑龙江早有失败教训，因此新练军在无法通过增拨经费转为常备军的情况下，最佳选择是缩减规模、停止换练，以保证兵员质量、军纪与训练强度。新练军执行换练时暴露出严重弊端，即证明了这一点：黑龙江初年换练，“八旗营屯于齐字营调换兵丹日久未能呈送”，屡次札催亦无结果；大量兵丁逃亡呼兰等地。[③] 据时人观察，齐字营换练时“十三四岁童子亦来应名”；即使降低额数后，“童子犹居十分之三”。[④] 吉林、黑龙江省城兵丁不足，只能从各城旗兵、西丹内挑补，[⑤] 每年往返换练路程遥远，大量撤练兵丁逗留不归。光绪十四年吉字营报告“上年九月撤回兵丹有尚未回旗，及未经各处咨报曾否回旗之兵丹，共有六百余名之多”。[⑥] 吉字营换练总数不过 2200 余人，不归旗者占比竟接近 30%。任职吉林的曹廷杰描述，吉林、黑龙江“遣撤之兵，即为游手，窝赌窃盗，率为民害”。[⑦] 若有急需，这些歇班兵丁根本无法及时形成战斗力。

就此情形，练兵大臣定安本有意改弦更张。光绪十四年初，定安会同三省将军联衔奏请改为就现有兵丁常年精练，“不必更番换练，徒务兵多之名”。[⑧] 结果因海军衙门反对，遭严旨驳斥：“换练西丹，月给津贴银两，所以维系其心，即以备征调之选，用意深远，岂可轻议更张。”[⑨] 很显然醇王在经费难以扩充的情况下，仍有意多练旗丁，以实现其“培植故土”的愿望，为此不惜牺牲练兵质量。本不合理的换练制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勉强维持。

另一方面，受醇王专用旗人将领的方针影响，新练军的统帅与指挥训练，亦大有问题。光绪十三年十月穆图善病故，清廷命定安接任练兵大臣。翁同龢闻信后私下议论：“今起定将军（安），其人老矣。捻窜直隶时，伊在运河边站墙股栗，士民腾笑者也。”[⑩] 定安曾主持过黑龙江练兵，效果不佳，此次奉命之初即致函姻亲长庚，请求帮忙辞差：“兄光绪六年到江后，起练队伍一年有余，该队于分合之势尚不知也，何论步伐。此固兄教练无方，而国人犹皆曰从前本省大帅大将南征北战，所向克捷，未闻有此议论者，呼应未免不灵。兄名望本轻，碍难置喙……”[⑪] 新练军高级军官多由侍卫大臣充任，教习又完全由醇王控制的神机营派出，“声气甚盛，教法之

---

① 定安等：《清内府奏折档·东三省练兵奏议》，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 年，第 122–126、148–151、236–242 页。

② 陈先松：《海军衙门经费析论》，《清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③ 《齐字营为前传八旗营屯等处兵丹仍未送省奉批事禀文》，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十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07020–0001。

④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 85 页。

⑤ 例如光绪十二年齐字营挑选兵丹，即分别来自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呼兰、巴彦苏苏、北团林子六城。见《有关齐字营挑选兵丁请领薪饷发放军火等事宜件》所收咨文，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04628–0001。

⑥ 《钦差大臣定为查核兵丹究竟曾否到旗有无遗漏迅赐见覆由》，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06967–0001。

⑦ 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光绪十四年九月，第 760 页。

⑧ 定安等：《清内府奏折档·东三省练兵奏议》，第 36–37 页。

⑨ 《清德宗实录》卷 252，光绪十四年二月丁未。

⑩ 翁同龢：《致翁斌孙函》，谢俊美编：《翁同龢集》第 2 册，第 532 页。

⑪ 《定安致长庚函》，约光绪十三年十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藏，函号 11。

勤惰，操艺之短长，统领以下不敢谁何”。[①] 兼以统帅软弱，焉能指望严肃军纪、严格训练？雪上加霜的是，醇王认为中法战争中“长门、沪尾之胜皆得力于短兵”，力主神机营加练藤牌、砍刀，[②] 东三省新练军亦在神机营教习指导下操演“五行八卦”等传统阵式，完全未接触现代战术，甚至以前膛枪训练打靶，重金购置的后膛枪均封存不用。[③] 徐宗亮直指该军“前期演一阵图，后期习一枪炮，余则嬉游市上，无异惰民”。[④]

醇王本设想以新练军承担东三省内外防务。光绪十三年二月，清廷将驻扎奉天的雷正绾部甘军裁撤，谕令穆图善考察凤凰边门、吉林珲春等边境重地应否拨练军填扎，却被穆图善以新军须集中操练等理由否决。[⑤] 穆图善虽致函醇王表示拟于当年夏秋间开始考察边情，[⑥] 但其很快去世，定安接任后，未见有布置新练军分守边境之议。光绪十四年总署奏准抽调两千名黑龙江齐字营官兵修建嫩漠驿路，齐字营兵丁竟聚众骚乱，定安会同黑龙江将军恭镗请求清廷收回成命。[⑦] 光绪十七年，新练军在参与镇压热河金丹教起义时，盛字营统领丰升阿致函吉林将军长顺指出：“素知奉、盛两军各怀意见，而盛字各营又系新练之队，战阵未经，终恐临事惧怯，至开导蒙、汉，安辑良民，以及震慑匪徒，剿除股贼，虽有该管统领、管带等，亦难必其各能胜任。”[⑧] 显然，由于换练混乱、军纪懈弛、指挥不灵，新练军无法承担边防重任，甚至连对内“剿匪”、维持治安都难以独立完成。既往研究多将新练军训练成效不佳归咎于练兵大臣定安，从上述情形看，定安固非良将，但对军营情形尚有切实认识；醇王则出于培植旗丁、恢复旧制等考量，一味坚持不切实际的军队组织模式和训练章法，似应承担更主要的责任。

三、镇边军组建与新练军缩编

东三省新练军成军之初规模庞大，但甲午时参战兵力甚属有限，重要原因是光绪十七年后该军进行了大规模缩编，停止换练，总规模削减三分之二。既往研究多认为此次缩编是练兵大臣定安的失策，有损东北边防。[⑨] 而事实上，新练军缩编与另一重要边防力量——黑龙江镇边军的组建有直接因果关系。醇王本人和海军衙门全力支持黑龙江新建防军，不惜大幅削减新练军经费，这是镇边军得以成军的关键原因。可以认为，醇王对新练军的失败虽难辞其咎，却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另一支较有战斗力的旗人军队。

镇边军的筹建者是光绪十五年出任黑龙江将军的依克唐阿。到任之初，其即上奏详陈黑龙江既有兵力战守均不足恃，提出增兵备边、变通营制、购置枪炮、编练水师、筹开山路、招垦闲荒等六项措施。该奏截然不同于醇王专用旗人的思路，不仅要求招募民人开垦闲荒，更在“变通营制”条目中明显突出民勇的地位，拟裁撤本省精锐营旗兵一千五百名，节省饷项招募民勇两千，剩余三千名旗兵与民勇混编，“务使旗兵与民勇互相操演，互相激励”。[⑩] 练兵大臣定安

---

①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 85 页。

② 奕譞：《九思堂诗稿续编 · 仲冬初八日校阅神机营演艺成什并序》，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清代诗文集汇编》编委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4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34 页。

③ 穆图善等：《东三省边防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 17 册，第 857、905 页。

④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 78 页。

⑤ 穆图善等：《东三省边防奏稿》，《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第 17 册，第 784–791、814 页。

⑥ 《醇亲王府档案》，钦差大臣穆图善，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档案号：38–00–000–000004–0048。

⑦ 刘文鹏、李伯禹：《“黄金之路”考辨——近代以来嫩漠路的沿革》，《近代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

⑧ 《丰升阿禀大叔大人（长顺）文》，光绪十七年，《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78 册，第 86 页。

⑨ 李英全：《更新而不去旧——晚清旧式军队的整顿和改造》，第 63 页；方玉权：《改造八旗与强边未竟：晚清东三省练兵（1885—1895）》，《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⑩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为熟筹黑龙江全省应办事宜事》，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54 辑，第 378–380 页。

对其计划亦属支持，据李鸿章所言，裁旗兵募民勇之议即发自定安。[①]

醇王对依克唐阿之奏态度复杂。一方面，他不满该计划流露出的裁抑旗兵倾向。醇王亲自起草的海署议复折，明确驳回有损旗人利益的变通营制、招民开垦两条，质问："该将军于旗兵贫窘情形固已言之历历，若将腾出之饷改募民勇，则除裁现存之旗兵，岂非仍前苦累？"要求仍就现有旗营认真简练，并选择本省旗员统带，不必外调将领。此外更不准招民垦荒。另一方面，醇王也认可依克唐阿所议各条皆属边防要务，请旨令依克唐阿统筹新建防军的详细计划。[②]

此时，由于国际局势变动，清廷对东北边防的紧迫感大为提高。光绪十六年初，李鸿章入京会同醇王、总署王大臣筹议朝鲜问题，提出精练东三省水陆各军、兴建奉吉铁路、加强对朝鲜控制等六项措施。[③]其直接原因乃朝鲜国王遣使向清廷游说，要求撤回派驻朝鲜的大臣袁世凯，清廷认为朝鲜国王受外人煽惑，渐生离心倾向。[④]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应是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勘测工作正迅速展开，朝鲜又与俄国议定《陆路通商章程》，拟将邻近中朝俄边境珲春的庆兴府开放为通商口岸，清廷对此深感威胁。[⑤]在此背景下，黑龙江增设防军得到醇王的全力支持。

"朝鲜六策"议定后数日，依克唐阿所拟镇边军章程奏上。章程规定，该军由原有之"精锐营"练军汰弱留强，并增选精壮兵丹组建，规模达七千五百人，初年创办经费 85 万两，常年经费 68 万两，远超新练军齐字营饷额。除由原精锐营饷项抵充 30 万两外，每年尚需清廷拨付 38 万两。[⑥]醇王不仅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还要求再添设省城至边防军营、沿江卡伦的电报线路。[⑦]海军衙门议复折全盘批准镇边军组建计划，并承揽下为镇边军筹拨饷项之责："近年部库频动巨帑，支绌异常，自应由海军衙门设法挹注。"[⑧]

当时，醇王与李鸿章正忙于筹商另一重要边防举措——奉吉铁路的建设，每年铁路经费高达 200 万两，海军衙门并无闲款。醇王虽向李鸿章感慨镇边军饷项"真不易筹"，仍力任其难，提拨各省报效的拟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海军巨款"40 万两（后改为 30 万两）抵充该军初年经费。[⑨]至于常年经费，则决定由新练军缩编节饷：海署议复折规定，新练军由两班换练改为三班轮换，每班由 4500 人缩减至 3000 人，由此"三省通算，每年可节出饷银二十万两上下"，全部用于镇边军。[⑩]这一决策对东北边备进程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

海署复奏后，镇边军组建与新练军的缩编同步展开。光绪十六年八月，镇边军马队即告成军并起支饷乾，步队、水师各营于次年正月初一日正式成军。[⑪]同时，练兵大臣定安根据海署命令，制订了新练军三班换练的章程——每省马队编制不变，步队人数缩减至两千五百人，半年

---

① 李鸿章：《复督办黑龙江漠河金厂吉林即补道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 34 卷《信函六》，第 648 页。

② 《奕劻等奏为遵旨议复事》，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54 辑，第 385–388 页。

③ 《月折档》，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故枢 004189。

④ 《奕劻等奏拟商要件请旨遵行折（附李鸿章原函）》，《夷务始末记》，光绪十六年二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故宫 008406。

⑤ 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光绪十五年五月，第 805 页。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档案号：03–6118–044。

⑦ 叶渡：《清醇亲王奕譞书札册》，附录第二十函，《首都博物馆丛刊》第 14 期，2000 年。

⑧ 《户部为复奏黑龙江添改靖边练军营制并屯垦章程折奉旨允准事咨》所附奏折，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十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第 1094 页。该奏末尾注明"此折系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主稿"。

⑨ 《醇邸来电》，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 23 卷《电报三》，第 36 页。

⑩ 《户部为复奏黑龙江添改靖边练军营制并屯垦章程折奉旨允准事咨》，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十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第 1094 页。

⑪ 《为镇边军新旧练饷界不清速查明声覆事咨札黑龙江副都统衙门等》，光绪十八年七月初三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10109–0001。

换练。[①] 但此前执行换练制已存在严重问题，增加换练班次，缩短换练间隔，显然会加剧混乱。定安次年奏报，“自上年匀分三班，节出饷银二十万两，拨充黑龙江添练防军之需，于是办理遂行棘手……队伍既未能齐整，底饷又不免镠轕，而且习练之日少，歇练之日多，每逢换班，除盛军尚易调集外，吉、齐两军兵丹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均未能一呼即至。平时轮换往往不齐，倘遇征调，安望其缓急足恃。”[②] 黑龙江齐字营更与镇边军在兵丁归属上出现争执。齐字营方面希望镇边军主要从边境呼伦贝尔等城挑选兵丹，避免抢占省城兵源，但被依克唐阿拒绝。[③] 依克唐阿禁止齐字营兵丹加入镇边军，但由于镇边军饷项优厚，违规同时加入两军者仍不在少数。光绪十七年七月，齐字营换班兵丹共 2500 名内，缺额达 284 名。[④] 镇边军方面报告：“齐字营换练二班兵丹，因陆续挑补镇边军马步各队，兵额为数甚多，遂致该营之兵传集多日，尚未齐楚。”[⑤] 可见镇边军组建对齐字营换练造成更大困难。最终，练兵大臣定安于当年十一月奏请停止三班换练，三省新练军维持九千人规模；三年之后再察看地方情形，轮换下一班，歇练兵丹亦不再发给津贴。[⑥] 此时醇王已经去世，海军衙门批准了定安之请。[⑦] 由是，新练军实质上规模削减三分之二，年饷减少五分之一，地位明显下降。

镇边军则在清廷支持下，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不同于醇王和神机营全盘掌控的新练军，镇边军则由黑龙江将军统辖，直面地方实际军务需求，故其部署明显更加合理，调度、用人较为灵活，训练亦更为精勤。该军步队以五营驻扎黑龙江上游的嫩江源，五营驻扎下游绥化厅属铁山包以东，驻防之余试办屯垦，并增设卡伦、派兵驻守；另派一营驻防漠河金厂。马队六营拨归各城，用于缉捕盗匪，亦策应边防。此外设有水师一营。[⑧] 虽然受限于海军衙门规定，未能实现兼募民勇，但该军营制饷章皆仿照吴大澂创建的吉林防军，且作为常备军，驻扎边境和全省战略要地。这有助于保持军纪和兵员素质，避免新练军株守省城、每年换练造成的严重弊端。光绪十九年，淮军将领聂士成游历东三省时，对吉林练军评价甚低，却对镇边军的训练与军容印象深刻：“边军幼习骑射，鞍马枪械不练自知，命中之法尤称熟习，惟步伐非所素讲，未能尽善。近逢三、六、九日加意操演，可称得法。其队伍整齐，旗帜枪械亦俱鲜明，全军皆少壮，想见将军治略矣。”[⑨]

醇王的高度支持，更促使清廷始终保持对镇边军饷项的高度重视，即使在醇王去世后亦然。光绪十七年八月，依克唐阿奏陈镇边军常年饷银不敷 18 万两，获准由户部拨发。[⑩] 光绪十八年该军在造船、购枪经费之外的常规开支即达 69.8 万余两。[⑪] 由于军费充足，镇边军不吝巨款购

---

① 定安等：《清内府奏折档 · 东三省练兵奏议》，第 286–290 页；《有关齐字营兵丁调补请假领取口分出具印结及东三省红兵奏改新章奏请奖励出力员弁齐字营奏奖名单齐字营马队兵传调来营等》，光绪十六年十月，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08549–0001。

② 定安等：《清内府奏折档 · 东三省练兵奏议》，第 455–457 页。

③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本省新添练军仍拟由本省各城挑补事咨钦差大臣定安》，光绪十六年，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08508–0001。

④ 《黑龙江将军齐字营各统领东三省练兵大臣等为官兵挑补奖赏发领军贸军械等事往来件》，光绪十七年七月初十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09406–0001。

⑤ 《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转饬镇边军马队退还齐字营歇练兵丹另补队额事札镇边军营务处》，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09108–0001。

⑥ 定安等：《清内府奏折档 · 东三省练兵奏议》，第 455–461 页。

⑦ 定安等：《清内府奏折档 · 东三省练兵奏议》，第 621–634 页。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档案号：03–6118–041、03–6118–044。

⑨ 聂士成：《东游纪程》，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1、31 页。

⑩ 《为镇边军新旧练饷界不清速查明声覆事咨札黑龙江副都统衙门等》，光绪十八年七月初三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020–008–10109–0001。

⑪ 《军机处档折件》，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故机 135096。

置新式枪炮军火，装备精良。建军之初，依克唐阿即奏准购置新式哈乞开斯、毛瑟洋枪一万杆，以及后膛钢炮等，“军械浮于兵丹”。[①] 此后逐年增购。甲午战争中，依克唐阿率镇边军赴辽东前线作战，其军火大部分由黑龙江接济，截至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底，黑龙江为依克唐阿部拨发各种型号的毛瑟、哈乞开斯枪接近一万杆。[②] 这显然离不开镇边军数年来的积累。

新练军与镇边军的地位消长，在甲午战争中以及战后有鲜明体现。据统计，新练军参与对日作战的兵力约 7750 人，远不及醇王原定规模，且该军在战场闻风即溃，纪律恶劣，十分边缘化。[③] 依克唐阿率领赴奉天参战的镇边军，虽亦不敌日军，至少作战比较勇猛，先在草河口战斗中使日军受到较大损失，后会同长顺所率吉林各军，四次反攻海城，这是清军为数不多的进攻作战。[④] 袁世凯将依克唐阿所部镇边军与宋庆、聂士成部并列，称为清军中少有的“敢与寇角者”。[⑤] 甲午战后，督办军务处奏准东三省练军“概令裁撤”；[⑥] 镇边军则有所扩充，并改进操法。光绪二十五年，黑龙江将军恩泽奏准添练新军十五营，命名为“镇边新军”，沿用镇边军章程，并抽调镇边军精锐弁兵安插至新军，以加速其训练。[⑦] 可见，甲午战后直至庚子事变前，镇边军已成为黑龙江军事力量的主干。镇边军的相对成功，固然离不开依克唐阿的创议与主持，但醇王与海军衙门令新练军缩编节饷供给镇边军经费的决策，亦属功不可没。

四、余论

醇王主持的海军衙门不仅负责海军事务，实际上东北边防也是其关注重点。据定安奏报，截至光绪十七年底，东三省新练军共收到海军衙门拨款 558 万两；[⑧] 至甲午战后该军裁撤为止，海署拨款估计在一千万两以上。镇边军创办经费和常年军饷，也由海署提拨巨款，主持筹措。在海署支持下，新练军多年维持 2.7 万人的庞大规模，镇边军建成 7500 人的常备劲旅，装备精良。醇王对东北边防的高度重视，深刻影响了甲午战前的边备建设进程。

本次东北练兵不是单纯的军备建设，而始终与清廷高层、东北地方政局以及满汉关系问题纠葛缠绕。根据新见神机营所拟练兵草案以及醇王函札，三省各练五千新军的庞大增兵计划，很可能是由醇王创议并一力推行，其动因除边备外，更带有“培植故土”的深层考量。这是针对光绪初年奉天、吉林打破满汉畛域的地方改制，意图重振八旗军事力量，强化旗人在东北的军政优势地位。这也不仅是醇王的个人主张，背后更多有东北重要旗人官员的迎合与鼓动。正因如此，醇王在练兵筹议到执行过程中，强调专用旗人兵将，力求兵多饷厚，采取换练制以扩张兵力规模。光绪帝在谕旨中称赞练兵计划“用意深远”、不容更张，而此等深意恐怕正是练兵靡费无功的根源。

醇王虽“隐执朝政”，但政治权威不足，练兵计划在清廷高层阻力重重：户部出于财政压力反对大举增兵，李鸿章亦警惕练兵挤占北洋海军资源，致使新练军饷数大幅削减，更无法通过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档案号：03-6118-044。

② 《依克唐阿出征原带及续拨军火数目清单》，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 2 册，中华书局，1989 年，第 548-551 页。

③ 方玉权：《改造八旗与强边未竟：晚清东三省练兵（1885—1895）》，《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④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24-266 页。

⑤ 《袁世凯致李鸿藻禀牍》，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第 5 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 年，第 218 页。

⑥ 《恩泽致鹤帅仁仲将军（长顺）函》，光绪二十一年，《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78 册，第 458 页。

⑦ 《宫中档奏折》，黑龙江将军恩泽，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故宫 141019。

⑧ 定安等：《清内府奏折档 · 东三省练兵奏议》，第 643-656 页。

倍增饷额扩充为常备军。此等局面下，最佳选择本应是采取练兵大臣定安的务实建议，缩减规模、停止换练，但醇王出于培植旗丁的意图加以拒绝，本不合理的换练制被长期勉强维持，新练军训练、纪律大受危害。兼以专用旗将方针下，高级军官由清廷钦派，训练由神机营遥控，将骄兵惰，指挥不灵，操演与战术新旧杂糅，脱离时代。这导致新练军早在甲午战前多年，已陷入弊病丛生、难期御侮的局面。

光绪十六年创设的黑龙江镇边军，相较三省新练军，效果悬殊，可作为检讨醇王练兵之失的参照。不同于新练军服务于朝廷的政治目的，半独立于三省地方，镇边军直接负责本省边防与治安，官兵考核与人事权亦由将军掌握。镇边军不采取换练制，以大部分兵力驻扎边境，军纪与训练显然更胜一筹。镇边军的相对成功，亦离不开醇王的支持——在国际关系变动背景下，正是醇王主持的海军衙门决定新练军缩编节饷，挹注镇边军用款。这一决定导致新练军早在甲午战争开始前，实已停止换练，规模缩减三分之二，地位明显下降；也正因此，镇边军才获得了充足的常年经费，迅速成军且装备精良。可以认为，醇王“培植故土”的动机与专用旗人的狭隘性，对新练军的失败难辞其咎，但不应忽视其全力支持镇边军之举，在甲午战前东北边备建设中仍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References

Chen Kewei. “Wu Dacheng yu wan Qing Dongbei bianwu” (Wu Dacheng and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ffairs in the late Qing). *Qinghua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5 (2018).

Chen Xiansong. “Haijun yamen jingfei xilun” (An analysis of the “Haijun” Yamen’s funding).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 (2018).

Fang Yuquan. “Gaizao Baqi yu qiangbian weijing: wan Qing Dongsansheng lianbing (1885–1895)” (Reforming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unfinished strengthening of the frontier: troop training in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in the late Qing). *Jilin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2020).

Li Yingquan. *Gengxin er bu qu jiu: wan Qing jiushi jundui de zhengdun he gaizao* (Renewal without abandoning the old: the reorganization and reform of old-style armies in the late Qing).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4.

Liu Wenhua. “Chun qinwang Yixuan yin zhi chaozheng de fangshi yu xiandu” (The methods and limits of Prince Chun Yixuan’s behind-the-scenes control of the court). *Anhui shixue*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3 (2025).

Liu Wenpeng, and Li Boyu. “‘Huangjin zhi lu’ kaobian: Jindai yilai Nenmo lu de yange” (A textual study of the “Golden Road”: the evolution of the Nenmo Road since modern times). *Jindai shi yanjiu*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6 (2022).

Lu Fang. “Qingmo Dong sansheng bingzhi bianqian” (Changes in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in the late Qing). *Junshi lishi yanjiu* (Military Historical Research) 1 (1987).

Pan Xiangming. “Lun Chun qinwang Yixuan” (On Prince Chun Yixuan).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 (2006).

Qi Qizhang. *Jiawu zhanzheng shi* (A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4.

Wang Mingcan. “Yixuan yanjiu” (A study of Yixuan). PhD diss. Jiayi: Zhongzheng daxue, 2002.

Wang Yunsheng. *Liushi nian lai Zhongguo yu Rib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ast sixty year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1979.

Xu Xiaoyun. “Chun wang dangguo yu wan Qing zhengju: yi Jiashen yishu hou zhuzheng jingli wei zhongxin (1884–1890)” (Prince Chun in power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late Qing: focusing on his political experience after the Jiashen Coup, 1884–1890). PhD diss.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2020.

Yang Nianqun, ed. *Jiawu bainian ji: duoyuan shiye xia de Zhong-Ri zhanzheng* (Commemorating a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he war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eijing: Zhishi chubanshe, 1995.

Yang Yimao. “Yixuan yu yangwu” (Prince Yixuan and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Zhongguo renmi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1990).

Prince Chun *Yixuan* and the Qing Court’s Military Construction in Northeast China

ZHANG Yi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zhangyihe99@pku.edu.cn)

Abstract: A large-scale military training program in Northeast China was initi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ince Chun Yixuan following the Sino-French War. Discontented with the early Guangxu-era frontier policies in Fengtian and Jilin that blurr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anchu banners and Han populations, Prince Chun sought to “cultivate the ancestral land” by reinforc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ominance of the Eight Banners in the region. Due to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and Li Hongzhang, he was forced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originally allocated military budget, rendering the planned expansion of new troops unfeasible. He rejected reforms to the already proven ineffective rotation training system and insisted on recruiting exclusively Manchu bannermen, entrusting the training entirely to the Shenjiying, which led to systemic flaws in the newly trained forces. In 1890, amid shif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 Chun strongly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eilongjiang Border Defense Army, prompting the downsizing and cost-cutting of the previous training program and giving rise to a more combat-effective frontier force. Analyzing the convoluted trajectory of this Northeastern military initiative through the lens of Prince Chun offers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reassessing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frontier defense preparations prior to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political dynamics and Manchu-Han relations.

Keywords: Yixuan, Naval Office, Manchu-Han relations, Northeast military training, Zhenbian Army